



俞吾金

时代的哲学沉思

讲
演
录

俞吾金 /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俞吾金讲演录/俞吾金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45-1461-3

I. ①俞... II. ①俞...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881 号

俞吾金讲演录

著 者: 俞吾金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尹小光

出版发行: **长 春 出 版 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519908

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77级大学生，我于1978年初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4年12月获得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又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我在读研时期就开始作学术讲演，至今作过的学术讲演或报告已经数不清了。收入本书的15篇讲稿，都是本世纪初以来，即近10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下所作的讲演。

在编写本书时，我给自己确定的第一条原则是可读性。也正是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我曾经作过的不少学术上的专题讲演都没有收录进来。即使是非学术专题的讲演，有时也会遭遇到一些晦涩的理论问题，我尽量作深入浅出的阐释，使读者易于领会其中的奥妙。

我给自己确定的第二条原则是思想性。在非学术专题的讲演稿中，我选择的是偏重

思想性的稿子。在某种意义上，一次讲演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是否有新的思想被表述出来。思想性之于讲演，就像盐之于汤，决不能用老生常谈去浪费读者的时间。

我给自己确定的第三条原则是主题的多样化。我把 15 篇讲演稿分置于哲学篇、思想篇、历史篇、文化篇和反思篇这五个不同的篇目中，当然，这并不表明这些篇目各自完全是独立的，只是表明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反思篇，置于这一篇目下的三篇讲演都涉及对自我的反思。在这个快速转型的社会中，对自我的反思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能够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人，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成功的弄潮儿。

本书附录是一篇关于我的采访录，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我的学术经历、我近年来的思考以及我将来的研究计划，欢迎读者不吝赐教。

目录



前 言	1
-----	---

哲学篇	1
-----	---

- 哲学的困惑与魅力 / 1
- 哲学思维的四个触角 / 18
- 哲学：刨根究底的思维 / 30

思想篇	40
-----	----

- 失去了的思想维度 / 40
- 启蒙的缺失与重建 / 75
- 当代虚无主义省思 / 91

历史篇	112
-----	-----

- 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 / 112
- 历史错位与价值重建 / 127
- 如何面对偶然性 / 135

文化篇	145
-----	-----

- 当代中国文化病症诊断 / 145
- 新上海人的生活观念 / 163
- 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的四重关系 / 172

反思篇 ————— 183

找回真实的自我 / 183

走出自我的困境 / 192

我们应该如何思维 / 204

附录 综合、创造与启蒙 ————— 222

后 记 ————— 250

哲学的困惑与魅力*

中国人常说：“水至清则无鱼”。如果我们见到一泓清澈的泉水，我们也许会喜欢它，但不久以后，就会陷入审美疲劳。因为它显得过于清澈、过于单纯，以至于我们的想象力无法施展开来。与此不同的是，哲学却如一个深渊，谁也看不清，想不透。有趣的是，它留下的困惑越多，它彰显出来的魅力就越大。

哲学：永无休止的追问

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经说过，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这句名言为以后的许多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引证，用以解释哲学的起源。但在我看来，这句名言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科学都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所以，当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时，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因为当时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科学：一种叫

* 2004年10月，本人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哲学的困惑与魅力”的学术讲座，该讲座全文发表于《文汇报》2005年1月2日。

the first science, 即第一科学或哲学, 指的是研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being qua being)的这个部分; 还有一种叫 the second science, 即第二科学, 也就是 physics, 即物理学, 但当时“物理学”的概念相当于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是一切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科学的总称。也就是说, 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和物理学区分开来了。其实,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 物理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由此可见, 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新见解, 人们夸大它的意义只能表明他们自己缺乏批判性的眼光。

按照我的看法, 哲学应该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的惊奇”, 就是 wonder of wonder。假如说, 单个 wonder 是对实证科学而言的, 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说, 物理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 那么, 两个 wonder, 即 wonder of wonder 则是对哲学而言的。显而易见, 与一切实证科学比较起来, 哲学的起源具有更深的含义, 它实际上是对实证科学关于外部世界的惊奇再表示惊奇。如果说, 实证科学家对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表示惊奇, 并试图加以破解的话, 那么, 哲学家的思索将更为深刻。他不但像实证科学家一样, 对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同样表示惊奇, 并试图加以破解; 他还得站在实证科学家的后面, 破解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即为什么这些实证科学家只是对外部世界的“这些现象”发生惊奇, 而对其他现象则无动于衷? 事实上, 哲学家思索的重点通常落在第二个问题上, 这也正是 wonder of wonder 的含义之所在。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谚语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如果用到我们现在的話題上来的话, 也许能帮助我们对哲学做出合情合理的理解。我们不妨把“蝉”理解为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 把实证科学家理解为“捕蝉”的“螳螂”, 而把哲学家理解为捕捉螳螂的“黄雀”。当然, 哲学家不会像“黄雀”吃“螳螂”那样“吃掉”实证科学家, 哲学家感兴趣的是: 为什么实证科学家的注意力会聚焦于这些现象, 而不是另一些现象? 为什么他们会提出这些问题, 而不是另一些问题? 换言之, 实证科学家对自然的观察和思索究竟是受什么深层因素制约的?

在通常的情况下, 实证科学家把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作为自己观察和思索的对象, 但他几乎从来不会深入下去追问: 为什么我会把这些现象; 而不是另一些现象作为我关注的对象? 显然, 这一反身向内、以思索者自身作为思索对象的追问方式, 通常是由哲学家来担当的。众所周

知，古希腊学者泰利斯十分注重对天象的观察，以至于有一次他仰望天空时，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坑里。于是，连他的女仆也讥笑他的迂腐。其实，真正可笑的并不是泰利斯，而是那个完全缺乏哲学思维的女仆。为什么？因为假如其他哲学家在场的话，他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泰利斯会如此专心致志地观察天象？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社会中，每年秋天农作物究竟是丰收还是歉收，与气候即天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农作物的丰收或歉收又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状态。因而我们发现，泰利斯之所以如此专心致志地观察天象，并不是在从事一种无聊的游戏，或满足于一种奇怪的嗜好，他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源于他对自己及周围人的生存问题的关切。由此可见，真正迂腐的不是关注人们的生存问题的泰利斯，而是那位对人们未来的生存状态茫然无知，也毫无关切之情的女仆。

这样一来，我们对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差异和关系似乎获得了新的理解。要言之，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的惊奇”，它是为实证科学证明思想前提的。比如说，在当今社会中，像试管婴儿和人体克隆这类问题，引起了生命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的巨大兴趣，而哲学家不仅对这类重大的问题本身发生兴趣，更对生命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为什么对这类问题产生巨大兴趣而发生兴趣。也就是说，哲学试图通过自己的刨根究底式的思维方式，澄清生命科学和医学的思想价值基础，即究竟哪些问题的探讨是对人类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有益的，而哪些则是有害的，从而为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指明方向，因为生命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通常关注的是科学事实，而不是隐藏在事实背后的思想价值。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哲学是一门高高在上的学科，是一种十分抽象的学问。这种见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哲学思维涉及到的通常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所以，在缺乏抽象思维训练的人们那里，尤其是在倾向于感性思维的女性那里，确实会激起一种沮丧的情绪。但在我看来，在所有的学科中，哲学不但不在高处，反倒是在最低处。也就是说，它是最具基础性的学科。所谓“最具基础性的学科”的含义是，它是为所有的实证科学提供思想价值基础的。换言之，一切实证科学唯有自觉地把全部研究活动奠基于哲学所揭示的思想价值之上，才可能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正如“水果”这个抽象概念是通过苹果、梨、甘蔗、桔子、香蕉等具体的果实而表现出来一样，哲学也是通过各

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和见解表现出来的。我们并不是说，一切哲学流派都会拥有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其实，在哲学上要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也需要对不同流派的哲学见解进行批判性的比较和反思。无论如何，正确的思想价值观总是在哲学这个学科的范围内得到澄清的。

如果说，实证科学关注和询问的是事实（fact），那么，哲学关注和询问的则是价值（value）。也就是说，哲学并不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进行思维，它关注的是实证科学的基本见解的价值基础。众所周知，在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中，画着一个敞亮而典雅的大厅，大厅的中央站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周围有好多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或者三五成群地讨论着什么问题，或者独自一个人陷入了深思之中。事实上，“雅典学院”这幅画的主题表明，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起源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困惑与惊奇。事实上，正是种种悬而未决的困惑引起了人们对哲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的经久不衰的兴趣。

后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写了一篇散文《梦》，在他梦中出现的正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的情景。狄尔泰由此而发挥道：“永不熄灭的形而上学的动力是想解决世界和生活之谜。”^①事实上，“雅典学院”这幅画的画面也表明，哲学家也就是“问题家”，即善于因惊奇而发问的人，而哲学史实际上也就是问题史。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是科学家们不断地提出问题、探讨问题的历史。

当然，有的问题是新冒出来的，也有的问题正像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如果改变一下它们的提法，那么原来的问题也就消失了。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其核心则无例外地是对各种问题的思索。罗丹的“思想者”的塑像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男子，正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那么，他究竟在思考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思考的无非是关于人生和宇宙方面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哲学首先需要一种问题意识，也就是说，研究者要善于思索，善于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带着问题去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或在阅读文本时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疑问，而是见到什么就相信什么，

^①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阅读什么就崇拜什么，那么他是不可能在哲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里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的思想的。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哲学问题》（1912）一书中曾经说过，哲学家们思考的都是一些深奥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就要用比他们更荒谬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解答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哲学探索与问题意识（或我们的困惑）之间，始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难怪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总是对哲学家的沉思，即那种类似于罗丹的“思想者”的沉思，予以怀疑和讥笑。比如，据古代希腊学者的记载，苏格拉底经常站在别人的屋檐下思考哲学问题，有时候竟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天一夜！又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总是边散步边思考哲学问题，有一次竟然走丢了一只鞋也不知道。再如，中国哲学家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教书期间，完成了手稿《知识论》，他把这部书稿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有一次，遇到空袭，家里其他东西他都没拿，只抱着这部书稿跑了出去。在防空掩体里，他害怕书稿丢失，把它坐在屁股下。等到空袭过后，他还没有从哲学的沉思中完全摆脱出来。他竟然站起身来就走了，忘记了坐在自己屁股下的那部书稿！当他想起来再去找时，那部书稿早就没了。他懊恼万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他居然把这部 70 多万字的书稿重新撰写出来了。这是何等伟大的毅力啊！在哲学家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些古怪的故事。事实上，当他们陷入沉思时，就会出现心不在焉或违反常理的举止。然而，他们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面临的某些重大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浮躁和浮夸的时代来说，这种哲学的沉思非但不可或缺，反而显得越来越必要了。事实上，没有这种专心致志的哲学沉思，没有这种思想的深度还在某些学人的身上延续着，这个时代就会像柳絮一样变得轻飘飘的了。记得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提出过“退隐与复出”的重要思想。在他看来，任何一种伟大的、原创性思想的提出，都要经历一个退隐与复出的过程。比如，耶稣在死去（退隐）以后再复活（复出）；佛陀在菩提树下沉思了多年（退隐），后来创立了佛教，开始设坛传道（复出）；同样地，穆罕默德也在沙漠里面壁多年（退隐），创立了《古兰经》，并在布道中赢得了大量的信徒（复出）。所有这些都表明，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在缜密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学术研究活动中，任何浮躁的、轻率的做法都只可能葬送学术

本身。人们通常把那些发到他们 E-MAIL 信箱中的广告称做“文字垃圾”，其实，他们应该对“文字垃圾”这个词的内涵获得更宽泛的理解。按照我的看法，对自己所研究的学术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推进的所谓“学术成果”都属于“文字垃圾”的范围。这些所谓“学术成果”或许可以解决一个人的学位和职称，却不能真正地推进或提升学术。^①

众所周知，马克思写《资本论》前后花了 40 年时间，去世前也只出版了第一卷；歌德写《浮士德》前后断断续续花了 60 年时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样地，康德为了撰写《纯粹理性批判》，沉默了 12 年，而把这部书稿撰写出来只花了四五个月。

所有这些都表明，解决哲学中的困惑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态来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的、浮夸的风气都是于事无补的。现在有些青年学者热衷于“炒作”自己，一开口就吹嘘自己出版了多少部著作，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我们很想追问：这些论著都是有质量的吗？它们对我们的学术研究都有实质性的推进吗？假如这些出版物都是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东西，那么能够证明的，不是它们的作者多么具有原创性，而是出版社和学术刊物的编辑多么缺乏眼光和责任心。就我自己来说，我于 1993 年晋升为正教授，当时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今后凡是我撰写的研究性成果，如果没有体现出新的视角、新的见解或新的方法，决不拿出去发表。在我看来，创新乃是研究性的学术成果的灵魂，如果一篇（部）作品没有灵魂，也拿出去发表，它与谋财害命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

其实，在学术上真正具有推进性和穿透力的成果，并不单纯地取决于数量，然而，轻信的人们总是沉湎于“数量崇拜”。所谓“著作等身”的说法，仔细地加以体会，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股强烈的讽刺味。我经常开玩笑说：“著作等身”只有以下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某个学者的个子长得特别矮小，所以做到著作等身就比较容易；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位作者的论著的字体特别大，行距特别宽，页边的空白特别

①我们很容易联想起黑格尔说过的一段话：“现今我们已经超出了康德哲学，每个人都想推进他的哲学。但所谓推进却有两层意思，即向前走或向后走。我们现时许多哲学上的努力，从批判哲学的观点看来，其实除了退回到旧形而上学的窠臼外，并无别的，只不过是照各人的自然倾向，往前作无批判的思考而已。”参阅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18～119 页。

多，所以他的论著垒起来大概也比较容易“等身”。真正地说来，学术论著的价值要从其质量上得到规定。比如说，有的自然科学家撰写的论文，不过几百个字，一个演算的公式，就获得了诺贝尔奖。由此可见，文字不在于多少，关键在于这些文字是否体现出作者的原创性的思想。如果每篇（部）作品的原创性都是“零”，那么，把所有的“零”叠加起来，仍然是“零”，这里不会有任何奇迹发生。就像所罗门国王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

究竟如何理解哲学

如前所述，哲学与实证科学在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是：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向外的，而哲学的思维方式既有向外的一面，也有向内的一面，即对哲学自身的永不休止的反思。

举例来说，假如有个学者说：“张三有张三的哲学，李四有李四的哲学。”他的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呢？乍看起来，这样的说法是无可挑剔的，但细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有语病的，因为它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哲学。其实，按照我的看法，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哲学只能以单数的方式出现。那么，什么东西才可能成为复数呢？我的看法是：哲学家是复数，哲学学派是复数，哲学观点或哲学理论是复数。所以，刚才那句话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张三有张三的哲学观点，李四有李四的哲学观点。因为哲学观点可以是复数，然而哲学却始终是唯一。也就是说，只能有 philosophy，不可能有 philosophies。

如果你深入地思考下去，就会发现，甚至整个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当前中国大学里的哲学系或哲学研究机构通常把哲学划分为以下三个重要的部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趣的是，这里的“中国哲学”是以政治国家作为分类原则的，“西方哲学”是以地域作为分类原则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以学派作为分类原则的。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分类原则是贯彻到底的。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些缺乏统一性的分类原则中，犹太哲学、阿拉伯哲学、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韩国哲学、拉丁美洲哲学、非洲哲学等等，又将放在什么地方呢？世界哲学不成了一堆碎片了吗？显然，目前

仍然占支配地位的这种分类方式亟须进行改革。

进一步的思索还启示我们，甚至像“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这样的概念也是有语病的，它们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是：只要有一个国家，就必定会有一种相应的哲学。或者换一种说法，难道哲学竟然可以用政治国家的国境线来划分吗？比如，苏联已经解体为 16 个不同的国家，难道“苏联哲学”也已经被“16 种哲学”所取代了吗？还有，在目前世界上存在的 200 多个政治国家中，有的国家非常小，简直是弹丸之地，如卢森堡、新加坡、锡金、斐济、马尔代夫等等，它们几乎不拥有知名的专业哲学家，但我们也必须用“卢森堡哲学”、“马尔代夫哲学”等等加以称呼吗？为什么人们一定要把哲学放在政治单位——国家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主张把比国家范围更宽的“文明”（civilization）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东亚文明就把许多东亚国家全包含进去了。难道哲学不应该以更灵活的方式来规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吗？总之，“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这类提法的荒唐可笑，丝毫不逊于“中国物理”、“印度物理”这样的提法。事实上，正如哲学不可以用国境线来划分一样，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实证科学也不可以用国境线来划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这类提法流行起来，哲学又成了复数。其实，正如金岳霖先生所指出的，逻辑上更合理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哲学在中国”、“哲学在印度”，因为这样的表达方式确保哲学永远处于单数的状态中，永远只是一门学科，而不是像叔本华所批评的，哲学竟然成了一个长着许多脑袋的怪物！

在厘清上述概念后，现在必须对哲学自身进行追问了。这种追问方式几乎出现在任何一部导论性的哲学著作中，即“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人们对这个问题几乎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其实，正是这种“习以为常”阻滞乃至窒息了哲学对自身的追问。在我看来，“什么是哲学？”这种提问方式已经蕴含着一种危险，即阻止我们去通达哲学自身的真理。

为什么？因为“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这种提问方式源于日常语言中“这是什么（What is this）？”的提问方式。比如，我们在教小孩学习语言时，总是指着一个对象，如一个杯子，问他：“这是什么（What is this）？”而他则回答道：“这是一个杯子（This is a cup）。”细心的听众已经发现，“什么是哲学？”这种提问方式源于日常

语言中“这是什么？”的提问方式。

然而，在“这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中，已经包含着一个理论预设，即被询问的对象，如一个杯子已经现成地摆放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询问“什么是哲学？”时，无形中也引入了一个理论预设，即把哲学也看做是一个像杯子那样现成地摆放在那里的、有待于我们去询问的对象。换言之，当人们把哲学理解为一个现成地摆放在那里的东西时，它与询问者之间的意义关系就被遮蔽起来了。实际上，当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工作时，一个杯子并不是随意地、偶然地摆放在桌子上的，因为在桌子边工作的人需要喝水，而喝水与这个人的生存相关。也就是说，正因为盛满了水的杯子和工作者有着生存论意义上的联系，这个杯子才会出现在桌子上，从而引起进入书房的、作为观察者的人们的注意，并以主题化的方式进入他们的思想视野。乍看起来，当人们指着一个杯子发问：“这是什么（What is this）？”时，这个问题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因为人们也可以指着桌子上的一支笔或一本书发问。然而，无论是杯子、笔或书，它们以聚合的方式出现在书桌上，决不是偶然的或随意的，事实上，正是这些物品与正在书房里工作的人构成了一个因缘整体。

这就启示我们，真正的哲学思维乃是自觉地让我们自己置身于生存论境遇中的一种思维。事实上，也只有把思维置于这样的境遇中，哲学家才能看到实证科学家或普通的观察者所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哲学不能脱离我们的生存状况，以现成的知识对象的方式被询问。尽管哲学与杯子、笔或书本是有差异的，然而，它们的共同点却是：它们都是人类生存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具体地说来，杯子的存在指向人的生理上的需要，笔的存在指向人的写作上的需要，书本的存在指向人的阅读上的需要，而哲学的存在则指向人的精神上的或灵魂上的需要。

由此可见，一旦哲学被曲解为像一只杯子那样现成地摆放在桌子上的、单纯的求知的对象，它与作为询问者的人之间的意义关系就被遮蔽起来了。所以，“什么是哲学？”这种单纯求知的提问方式和句型已使我们无法真正地洞见哲学的真谛了。也就是说，人们追问哲学的错误的提问方式使他们永远与哲学失之交臂了。

那么，人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正确的方式来提问呢？就人与哲学之间的意义关系而言，他们应该以下述方式来提问：“为什么人类需要

哲学 (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正是这一提问方式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另一个方向,即探究哲学对人类究竟有什么意义的方向上,把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必定与之打交道的一切(包括哲学)理解为一个因缘整体,而不是看做一个漠然置之的知识性的对象。为了用这种新的提问方式来引导人们对“什么是哲学?”问题的思索,即为了使人们不撇开哲学对人类的生存活动的意义来解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我提出了“问题际性”(inter-question)这一新概念,即把下面两个问题用连字符号贯通起来进行提问:“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什么是哲学 (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What is philosophy)?”这样做的意图就是要人们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去解答第二个问题,否则,他们就无法获得哲学之真理。

哲学认识论中的悖论

一旦着手探讨哲学认识论问题,人们实际上已经假定自己置身于认识论语境之中了。何谓“认识论语境”(epistemological context)?在我看来,所谓“认识论语境”,也就是预先假定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媒介(如语言)的存在。因为没有这样的假定,认识论的问题就无法加以讨论。打个比方,某人说:“张三马上就要去巴黎。”假如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它一定预设了两个前提,即“我”和“巴黎”的存在。有趣的是,以往的哲学教科书总是撇开认识论的语境提出如下的问题:人类诞生前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认识论语境事先已经假定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认识对象和认识媒介物的存在,甚至连“人类诞生前的世界”这一短语的提出,也是以人类的先行存在作为必要条件的。所以,当人们撇开认识论的语境,去追问未受人这一认识主体“污染”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乃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因此,人们只能在认识论的语境中去认识世界。事实上,当人们去认识世界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困难:一方面,世界乃是生命的流动。换言之,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构成了世界的本质。然而,当我们去认识世界时,却无法把握它的流动性,只能通过时间、空间和各种范畴、概念去切割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活生生的世界被“谋杀”